

0000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道教文化

孙亦平
著



【xuán】



南京出版社

0000

道教文化

孙亦平 著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5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文化 / 孙亦平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3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ISBN 978-7-305-09684-6

I. ①道… II. ①孙… III. ①道教—宗教文化—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B95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809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书 名 道教文化

著 者 孙亦平

责任编辑 黄隽翀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1.75 字数 162 千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684-6

定 价 22.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诸文明中独领风骚，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遗产，并仍然影响着国人的生活习俗、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不绝于史，不同的时期带有不同的特点，崇佑与贬损也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侵袭，中华民族遭受了史所未见的危机，仁人志士们以矫激的心情对中华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些文化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评判中带着些许急切救亡的不安情绪，传统文化中落后的成份被视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此后的一次次文化讨论乃至“革命”，让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涂上了原罪的色彩。但即使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仍有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较为冷静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予以客观冷静的评价。学衡派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之中，仍然认为孔子是世界文化伟人。他们认为只有弘扬民族精神，“以人格而升国格”，才能重建民族自尊。冯友兰、贺麟等人高张民族文化的旗帜，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后，他们以此作为御敌图存的精神支柱，以“接着讲”的绍承学统的气魄，视儒学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即使是上世纪末，当“大河之殇”的悲慨气氛笼罩中华大地时，匡亚明先生仍邀集海内外学人共同研讨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与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而中国文化巨匠钱穆先生则在其九十多岁高龄时，写下了《天人合一论》，认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文化为宗主”，认为中国文化中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现代性意义。这些文化精英们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探索为我们今天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悠远的大漠驼铃，记录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晚近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了认识中华文化价值的核心，并为世人所关注。其中虽然有马

克斯·韦伯和约瑟夫·列文森等人的悲观判断,但东亚儒学文化圈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中华民族中具有的世界精神,儒教世界观中具有的人道主义和合理主义,这些都具有现代性和普世性特征。不管是正面的肯认还是负面的批判,都应该以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与理解为前提。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开创新文化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邀集一批学者编撰了这套《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以期对中华文化有一个较系统的认识。本丛书主要从经纬两个方面来展示中华文化的林林总总。其中既有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基本脉络的回溯,诸如:先秦诸子、孔孟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因为思想乃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中国古代思想同样如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曾说过:“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是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同时,也有对中国文化各个侧面的展示与分析,如,独具东方情韵的诗词书画、箫鼓琴瑟、戏曲小说,等等。中国文化的诸形态与内涵交光互映,经纬错综,共同成就了其缤纷的色彩和多元的结构。

各种文明都有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象。承认糟粕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们并不讳言中华文化也存在着一定的糟粕,重要的是在建设现代文明时努力剔除其糟粕,保留与光大其精华。而建设现代文明,也是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深刻、准确地了解过去,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编撰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动因。

周 群

2013年5月于远山近藤斋

道教文化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道教的历史	4
第一节 源头活水	4
第二节 创立与改革	10
第三节 发展与衰微	25
第二章 道教的基本信仰	37
第一节 得道成仙的奥秘	37
第二节 多神信仰的内涵	41
第三节 洞天福地的影响	49
第三章 道教的教理教义	54
第一节 以道为本的宇宙论	54
第二节 形神合一的身心观	57
第三节 贵生恶死的生命观	64
第四节 为善去恶的伦理观	73
第四章 道教的仙学精神	82
第一节 保养精神以长存	82
第二节 药物养身以延命	84
第三节 性命双修以成仙	88
第五章 道教的修道之术	95
第一节 仙道多途的丰富内涵	95

第二节	烧制外丹的经验与局限	105
第三节	修炼内丹的步骤与方法	114
第四节	探索自然取得科技成就	125
第六章	道教的文化形式	137
第一节	宫观建筑的文化风格	137
第二节	斋醮科仪的艺术特色	153
第三节	诗词歌赋与绿章青词	167
第四节	神异小说与说唱戏曲	176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源自上古时期的原始宗教、战国方仙道和秦汉黄老道，在先秦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又融会吸收了儒、道、墨、阴阳、神仙、方技和养生等诸家的思想，通过神化老子以及有关“道”的学说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修道方法，在古代民间巫术活动和先秦宗法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展开斋醮科仪（俗称“道场”，谓之“依科演教”，简称“科教”，也就是法事）活动，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道团组织。

东汉末年出现的五斗米道，宣扬“以善道教化”，通过对老子与老子之道的神化，建立了以“太上老君”为信仰核心的神学理论和修道方法。之后，“道教”就特指由五斗米道而发展起来的天师道了。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内部自我改革的完成，人们经常将道教与外来的佛教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诸家也就不再被称为“道教”了。“道教”一词从圣人的“宣道之教”而成为诸子百家的自称，再发展到公元5世纪时仅将“天师道”称为“道教”，实际上就反映了道教在中土兴起，并以一种宗教形态逐渐与儒、佛等并列的发展历程。

道教从创立之初，就以老子《道德经》为理论基点，围绕着人应当如何修身养性才能达到升玄之境而建立了以“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道教信仰是人对超越有限存在的无限整体——“道”的体悟和把握。这种对绝对无限整体之“道”的体悟和把握，超越了世俗之人的经验，却又是由生活于具体时空中的世俗之人通过日常的修道来实现的，它体现了神圣与世俗的统一，所以说“道之在我之谓德”、“德言得者，谓得于道果”。道教的这一特点与其所信仰的“道”的内涵精神是相一致的。意蕴丰富的“道”既表现为形而上之神圣的绝对，又存在于事事物物之中，同时还是人的生命存在之根本。超越世俗的神圣之“道”与世俗生活中的人伦日用之事不是完全隔绝，而是相即不离的。正是由于作为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源和主宰之“道”，既超越于人，又内在于人而存在，因此，道教强调“一切众生，皆含道性”，同时又认为，修道者依持道性，以“至静元心”来因循事事物物的自然本性，就能返璞归真而与道

相契。

这样,道教“得道成仙”的信仰就形成了两重性:一方面极力宣扬超越世俗而追求与道相契的神圣境界;另一方面,又并不要求人放弃世俗生活,甚至强调只有在世俗生活中先修人道,再修仙道,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才有得道成仙的可能。道教所说的修人道,是要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确立少私寡欲、恭谦无争的观念,通过提倡道德修养而促进人们自觉地追求神圣而高尚的境界。从《太平经》强调的“积德不止道致仙”,到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宣扬的“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都是如此。道教将“积德”、“为善”、“忠孝”和“仁信”等道德原则神圣化,既包含了对世俗社会道德准则的认定,也体现了希望通过弘扬道教信仰来提升人类道德精神境界的愿望。神圣化构成了道教提升世俗生活的精神情怀,世俗化则构成了道教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在社会中能够得到广大群众信仰的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信仰的神圣性就在于要个体之人摒弃种种物欲和情欲,将超越世俗作为走向神圣的阶梯。这就有可能会对“得道成仙”追求越甚,对人的自身生活就肯定越少。神圣化与世俗化虽然在表面上形成了道教内部的一种难以消弭的张力,但在历史上,由于道教强调先修人道、再修仙道,这种对人及其生活的肯定,在客观上使得神圣化与世俗化之间的张力隐而不显。事实上,道教将得道成仙作为终极理想,而成仙就意味着人的生命的无限延长,这就在信仰的前提下肯定了人的生命存在和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因此,道教信仰本身就包含了神圣与世俗这两重性。道教以一种关注人的生命的姿态切入了人们的生活,表达了人们对一种绝对完满境界的向往与追求,这就是道教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理论体系,并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道教文化所包含的以“道”为本的思想智慧,

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铸就,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通过研究道教来加深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了解就成为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今天,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一方面打破了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界限,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尤其是它创造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通过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的普及推广,正悄然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促使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与民族,更加珍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更加注重保护自己的优良文化遗产。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所造成的张力,对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境遇中,如何以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来认真挖掘、整理道教文化这一笔宝贵的遗产,使之推陈出新?又如何从古老的道教文化中吸取有益于人类文明与和平事业发展的优秀因素,来为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服务?只有全面地了解道教的历史发展及其独特的信仰和思想,才能更好地观照其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在南京大学长期从事有关道教的教学与科研时经常思考的问题。

道教起源于人们对自己生存状态的认识,并希望通过这种认识,来建构一条脱离现实苦难并获得生命的长存和实现永久幸福的道路。道教对人的生命本真的细致分析和对长生成仙信仰的实践体现出了对生命的关注,对人当下幸福的追求。尤其是通过“尊道贵德”,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提升到了一个超越日常世俗事务的高度,从而给人一种安身立命的智慧,启发人们懂得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返璞归真、修性返德而回归于自然之道,以一种清静无为、恬淡安宜、合理节欲的态度来面对生活。这其中贯穿了一个主题,就是说服人们不要过于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应去关注自我的生命成长,去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去追求成为自然而然、自性圆满的人。这种力图将有限的生命提升到充满艺术精神的诗化境界,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现实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我撰写本书来普及道教文化的主旨之一。

第一章 道教的历史

4

道教文化



张道陵像

道教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和张角创立“太平道”为道教的创建时期；魏晋南北朝，是道教由民间向社会上层传播并进行自我改革的时期；隋唐至北宋，为道教的兴盛和发展时期；南宋至明代中叶，为道教的新道派纷起并持续发展时期；明中叶至近代，为道教的逐渐衰落时期。道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逐渐完善了论证信仰的神学理论，建立起表达信仰的斋醮科仪和种类繁多的道术，并创建了一些将有共同信仰的人集合在一起的道团组织。本章不仅探讨道教产生的信仰、思想和社会根源，而且还将循着历史的轨迹来追寻道教在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第一节 源头活水

一般认为，东汉末年出现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早期道团，它们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创立，但如果探究一下现存最早的道书《太平经》问世与传播的情况，就可见道教并不像某些世界性宗教那样是由某个教主依据自己的理念在短时间内创建起来的。道教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孕育期，是在不断汇聚中国古代多种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在政治动荡不安、自然灾害频繁、有神论思想高涨的两汉社会中逐渐形成的。早期道教的渐进性使它从一开始就以包容的

态度吸取各种文化因素来为己所用,从而形成了“杂而多端”的特点。

从宗教信仰上看,道教以老子之“道”为信仰核心的做法,渊源于中国古代母系氏族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以女性生殖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但道教信仰在演变发展过程中,又综合了上古三代的巫史文化、自然崇拜、鬼神信仰、民间习俗和各类方技术数等文化因素。从包罗天地万物、不受时空局限的“道”出发,道教在发展中以开放的心态兼摄百家之学,吸收民间社会所崇拜的各种神灵来充实自己的“万神之殿”,从而在信仰上形成了多神崇拜的特征。

道教虽然崇拜多神,但奉太上老君为至尊天神,这是道教最根本的信仰。道教的这种信仰特征是否与两汉社会流行的黄老学、黄老道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时期,无论是下层社会的民间百姓,还是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都将老子等同于“道”,尊为“太上老君”,认为通过祭祀老子不仅能够与“道”相沟通,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种神秘的力量,这是当时信仰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据《后汉



张角像

书·楚王英传》记载,东汉末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皇甫嵩传》曰:“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民间传道者正是利用这种“奉事黄老道”的方法不断地与统治者争夺与神相沟通的权力,这在客观上使东汉皇帝正统“天子”的地位逐渐动摇,最后,皇帝也不得不采取与民间传道者类似的宗教手段去祭祀老子,以保持政治与宗教上的统领权。据《后汉书·祭祀志》记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闕为坛,饰淳金鉤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可见,汉桓帝以帝王身份祭祀老子,并将老子视为神灵,奉上神座。正是在这

样的社会氛围中,初创时期的道教也顺应着时代潮流,提出“道”就是“一”,如《老子想尔注》中有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不仅将“道”作为道教的信仰目标,而且将“太上老君”奉为与道同一的尊神。

从思想理论上,道教虽然广泛吸收融合了先秦儒、墨、道、法、阴阳和神仙诸家的学说,但其理论基点却是老庄道家思想。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儒家创始人孔子生活于同一时代。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同样面对着“礼崩乐坏”的社会,老子却提出了不同于孔子的解决方案。孔子关注如何用仁、礼等方法来重建社会等级次序,主张个人在遭遇个体与群体的矛盾时,应当用“杀身成仁”的方法来维护群体利益;而老子则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社会文明异化的批判,来解构仁、礼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约束而导致的人的异化,以实现个体生命的关怀。老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其在《道德经》中不仅突破了上古三代对鬼神、上帝、天的信仰,而且还将理性精神贯穿于对天地人之道之认识和分析之中,所建构的以道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了哲学思辨、社会政治理论和人生关怀三个方面。《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其思想玄妙精微,包蕴丰富,义理深邃,从而被道教奉为根本经典,后又成为今天世界上除了《圣经》之外译本最多的古代经典。

老子之后,战国初年,道家又有杨朱、关尹和列子之学。杨朱发挥老学中“贵身防患”的思想,形成了“为我论”。孟子评价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学说以贵己重身、保全自我生命为要,与墨家学说提倡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和摩顶放踵、苦己利人的社会践行相对立,但却为活跃于齐燕滨海地区的神仙方士所宗。当时与杨朱齐名的道家学者还有关尹和列子。关尹曾为函谷关令,据《史记》中说,关尹在老子出关隐遁时,请老子著书五千言,言道德之意。列子曾就学于关尹,《吕氏春秋·不二》将这两家学说的特点概括为:“关尹贵清,列子贵虚。”可见它们都是对老子思想某一方面的阐发,但是,这种“清”、“虚”思想后来都成为道教理论中的重要概

念。关尹和列子也被道教奉为神仙。



河南鹿邑县太清宫镇老君台

真正能够继承老子思想并有所超越和突破的是生活于战国中期的庄子。庄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他建构了以道为本的宇宙论、以齐物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和以逍遥自在、安时处顺为特色的人生论等方面。超越和突破的重点在于，庄子提出了“道无所不在”的思想，并援气入道促进了老子道论的发展。庄子改变了老子对社会政治的一般性关注，而着力探讨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将对人生的关怀发展为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呈现出心灵哲学和境界哲学的特征。庄子通过对得道神人、至人和仙人的逍遥境界与特异功能的描绘，将老子的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和长生久视等思想具象化，为后来道教建构“得道成仙”的信仰提供了具体的素材。而老子与庄子共倡的静观、玄览、守一、坐忘、心斋和导引等修养方法也为道教所继承，并发展为以追求“得道成仙”为要旨的修炼术。

战国中后期，南方楚文化的老子学说与北方中原文化的黄帝崇拜相融合

形成的黄老之学标志着道家思想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被视为“新道家”的黄老学之所以“新”，如从学术层面上看，是指其以道家的道论为核心而兼取了百家之学；如从思想内容上看，则是为适应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黄老学的历史发展，经历了战国和秦至西汉初两大阶段。前期主要是齐国稷下学宫的稷下道家将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提出，这是黄老学的形成阶段；后期则是被当做一种政治方略而在社会管理中加以运用，可视为黄老学的应用阶段。黄老学以“清静无为”为宗旨，在汉初百废待举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并向注重个体避世修身以求成仙的黄老道演化。

黄老道对“爱气养神，益寿延年”的重视开了道教的先声。虽然对得道成仙的信仰是道教魅力四射的根本所在，但神仙并非为道教所创造。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之形成，是与当时人们对其生存状况及生命现象的强烈关注联系在一起，其中追求“长生不老”和“自由自在”的精神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神仙”观念的源头。《汉书·艺文志》曾对“神仙”作了独到的诠释：“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从宗教学上看，神仙既不同于存在于冥冥之中的精灵，也不同于人们常说的鬼神，其最大特征在于能够“同死生之域”，即超越了个体有限生命的束缚，达到了形如常人而长生不死之境。既然“神仙”是由现实之人的生命无限地延伸而来，那么人如何“保性命之真”？又如何“游求于其外者”呢？古人对此孜孜以求。从《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不死之山”、“不死之药”和“不死民”，到《楚辞》所宣扬的“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从《庄子》中的导引、守一、坐忘等延年术，到方仙道士们“化丹砂为黄金”的炼丹术，求仙之风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吹送，以至于到战国时出现了以寻求制造不死之药为基本特征的方仙道。方仙道以追求不死成仙为最高宗旨，并伴有祠灶祭神、望气导引和烧炼制药等方术活动，虽然带有浓郁的原始宗教巫觋气

息,但却为道教神仙信仰的建构提供了栩栩如生的形象和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当神仙方术通过黄老道转化为道教修炼术时,神仙方士也逐渐演化为道士,并活跃于齐燕滨海地区。

然而,信仰作为一种以真诚信服为特点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仅靠栩栩如生的崇拜对象和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哲学理论的支持。其实,神仙形象中隐含的古人希望并相信自我能在时间上达到永恒和在空间上消除任何束缚的思想才是道教神仙信仰得以挺立的重要原因。道教在创立之初,在把“保性命之真”的神仙作为自己宗教信仰的核心时,就力图从哲学上来论证“得道成仙”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而汉代哲学中比较注重对宇宙和生命的起源进行探讨,通常将“道”视为万物生成之本、“气”作为万物变化之机,这种宇宙起源论的思路与模式也影响到道教。汉代出现的道教经典,如《太平经》、《周易参同契》和《老子想尔注》等都从道与气的辩证关系出发,对人如何通过“保性命之真”而得道成仙的内外根据做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不仅初创了道教的哲学理论体系,而且也促进了道教仙学的形成。

从社会层面上看,道教是两汉社会生活的产物,却同时又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汉末年,社会政治动荡、自然灾害频繁,生活于天灾人祸之中的老百姓对统治者普遍抱有一种不信任感,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救世论”思想在社会中流行,这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因正在经历着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产生了信仰危机。《汉书》中的《五行志》、《哀帝纪》和《安帝纪》就多次记载了因民众对天灾人祸的恐惧心理而引发的骚动事件导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失范。民众为逃避自然灾害而四处流浪,在恐惧不安的生活中,他们不仅相互传递、争相佩带据说是来自西王母的神秘“诏书”,而且还希望通过歌舞祭祀西王母来保佑自己度厄不死。这种西王母救世思想所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人们对不体恤民情的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对寻求生存保障的极度关注。道教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应运而生,因此,如何

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和安宁的太平社会就成为原始道教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当时的一些好道者以去乱世、致太平为理想，提出了种种救世论。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到《太平青领书》反映了《太平经》非一人一时所作，它虽然内容庞杂，但主要代表了当时寒门士族的政治思想，既揭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外戚宦官争权误国、帝王无道且绝嗣、水火兵病之灾流行、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也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反对统治者的剥削与暴政，特别是以“天帝”派遣的“天师”的口吻来教化君主，并提出种种解除灾异以致天下太平的方法。《太平经》提出的社会改良主张虽然没有被统治者接受，但却在民间秘密传播，客观上对道教的初创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张陵在创五斗米道之前可能曾得到《太平经》的另一版本《太平洞极经》。后来创立太平道的“张角颇有其书”。太平道信徒相信“神人神师”、“天师”是“天帝”所派来拯救地上生民的，如《太平经》卷五十中有言：“人有道而称使者，神人神师也。”但太平道并没有遵循《太平经》中改良政治的做法，而是以“黄天太平”相号召，以伸张上天意志为使命来号令天下民众，后酿成的黄巾军起义最终导致了汉王朝的灭亡。

第二节 创立与改革

东汉是道教的形成时期，当时出现了有组织的道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以及以魏伯阳为代表的金丹道。大约与于吉在燕齐滨海地区传播原始太平道的同时，张道陵在蜀地鹤鸣山创立了五斗米道。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张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五斗米，故谓之米贼。陵传衡，衡传于鲁。”五斗米道是民间巫道与黄老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根据史籍中留下的片断资料可见，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有经典、仪式和科戒，通过奉诵《五千文》、《太平洞极经》和《老子想尔注》等道书来教化民众，以二十四治为中心建